

屈原异说

刘兆伟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7.22

责任编辑 刘东杰
封面题字 于植元
封面设计 谷品良
责任校对 王苏友

屈 骚 异 说

刘 兆 伟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06千 印数:1—5,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429·047 定价: 0.85元

屈原

深思高舉
潔白清忠
汨羅江上
萬古悲風



〔明〕弘治戊午（1498年）刻历代名人像赞本

序

友人推荐我抽暇读完了这部已经发排的书稿，并嘱我写几句读后的感想。对于《楚辞》，我素乏研究，故而说不出有份量的话。但又被作者勇于探索的精神和确有新意的文章所感动，勾起我不少的联想，因而也想说几句题外话。

作者称自己的这部书稿为《屈骚异说》，这并非好为苟异或故作惊人之谈，而是由于他确实有不少异于前人的见解和依据。综观全书，看出作者是从三个方面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一是细读原文，写出自己对原作词语或内容的训释与分析；二是征引前人诸说，或驳或申，尊重而不苟同，很多“异说”就是对此而言的；三是对《楚辞》的有关篇章相互参证，纵横抽绎，打破畛域，综合分析，不墨守相沿已久的作品分类说，找出自己的依据，从而得出新的结论。这些，也正是作者的劳绩。我不是说作者的所有论点都无可议之处的，学术上没有分歧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是从作者的上述做法中受到启示，那就是对于《楚辞》的研究也同样需要开拓新的途径，不论是资料的搜集，或者是方法的更新，都有着大量的工作等待着学者们去开辟。

有人说：“参天两地一灵均，文采昭然历劫新”，这话是切实的。屈子文采，历劫常新，两千年来的史实越来越证

实了这一点。“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的诗句，似乎就是诗人的自我写照。淮南王也罢，太史公也罢，“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考语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倒不一定同意刘勰那种以《离骚》与经传相比拟的做法，但他认为《离骚》当与风、雅前后辉映的见解还是可取的。至少“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也足以说明屈原作品的影响之大。孔夫子其生也早，没有能看到《离骚》，但他对《诗》的高度评价也完全适用于《楚辞》。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这番话，移赠《离骚》，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应当承认那是当之而毫无愧色的。当然，我不是要用孔夫子的尺度去评价《楚辞》，我只是说明《离骚》和《诗》一样，它的巨大影响是不会局限于某一方面，而且更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于研究者说来，应该而且必需从多方面进行开掘，以取得新的成果。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屈子及其作品两千年来在我国的影响确乎是深远而广大的，研究者们只要肯于留意，有价值的资料往往是屡有所得的。比如说，地处祖国东北边陲的辽宁在地域上和楚国故地的湖南、湖北不能说是不遥远，但在文化联系上却都是颇有踪迹可寻的。世界知名的营城子汉墓壁画的内容，就只有在《楚辞》中才能找到解释。画面上佩剑戴三山冠的墓主人上方，有一个似人非人，非兽似兽，身生羽毛，作飞翔状的怪物，它就是《楚辞·远游》中“仍羽人于丹邱兮，留不死之旧乡”句里所说的“羽人”。王逸说：“人得道，身生羽毛。”洪兴祖说：“羽人，飞仙

也。”“不死之乡，仙人之所宅也。”这就可知，画中的羽人就是引导墓主人上升天国，到“仙灵之所宅”的地方去。这是从出土文物上顺便提出可供参考的例证。而这壁画的内容与楚国故都郢城出土的文物又极为相似，人们只要参观一下荆州博物馆便可了然。

再如对于《离骚》语文的疏解历来皆极重视文献语言学的资料，这当然是应该的，但如肯于更多地从民俗学的角度做一些方言调查，便可以发现有不少属于学者们聚讼纷纭的词语，都能从民间话的语言中找到迎刃而解的力证。比如“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句中的“畦”字，王逸说：“畦，共呼种之名。”陆善经说：“为区隔也。”朱熹说：“陇种也。”钱杲之说：“田中为埧埧也。”林云铭曰：“十亩为畦。”戴震说：“犹陇也。”朱筠说：“《说文》田五十亩曰畦。”……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游国恩先生说得好：“此文畦作动词用，朱熹释为陇种是也。”然而学者们如果生活在华北或东北，农田耕作中“畦苗”一语是必用不可的，谁都知道此处的“畦”字是动词。又如“发轳”一词在《楚辞》中也不止一次出现，注解者也诸说不一。王逸说：“轳，耜轮木也。”吕向说：“轳，车轮也。”洪兴祖说：“轳，止车之木，将行则发之。五臣以为车轮，误矣。”洪兴祖的解释是正确的。在东北，车停止时常以木、石等物挡住车轮，即用此“轳”字，只是方音将卷舌读为平舌，读音与“掩”字相同罢了。类似这样的例子甚多，此处即不一一列举。我的意思是说，研究《楚辞》不论在方法上，资料的取得上，都是大有可为的。

那么，本书作者的劳动就更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

他正是以自己的方法得出了不同于别人的结论。比如，以为《天问》并无错简，并为之疏解；又认为《九歌》并非纯粹的祭歌，而是诗人借用祭歌形式以写己志，和后世的曹操用挽歌的形式来抒怀的做法相同。对于《橘颂》，认为并非少年时作品，而系后期所作。持论有据，言之成理，在治《楚辞》的学苑中，作为异军特起，应是有意義的。我之所見只是如此，当然难免貽笑于大方之家，謹希望批評匡正！

于 植 元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大连

目 录

《离骚》点滴辨	1
《离骚》所独有的艺术成就	9
《天问》的结构与析义	21
《天问》校释(上)	30
《天问》校释(下)	48
《九歌·东皇太一》新解	66
《九歌·湘君、湘夫人》的主题	69
《九歌·东君、云中君》辨析	74
《九歌·大司命、少司命》非祭祀星神说	84
《九歌·河伯》之真谛	92
《九歌·山鬼》通释	98
关于《九歌·国殇》的主人公	104
说《九歌·礼魂》	110
《九章·惜诵》的“迷不知宠之门”	113
《九章·橘颂》内容结构的异说	117
《招魂》首尾释	122
《远游》的作者及其远游思想	131

附 录

屈原去就问题管见	141
《九辩》作者为宋玉考略	148
后记	157

《离骚》点滴辩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离骚》，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浪漫主义杰作。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赞颂。因为它深切地表达了作者对祖国无限真挚的热爱和在恶劣环境中对美好政治的追求；在向腐朽势力作斗争中，坚贞不屈；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那些结党营私、祸国殃民的邪曲害公者流。人们读了《离骚》，无不为其正义不屈的精神所激励；无不痛恨那些巧言令色的谄佞之徒。正因为如此，《离骚》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而且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但是，人们对《离骚》某些字句的解释，由于所站的角度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颇多歧义。这就不能不影响对作品内容的深刻理解。本文试图就几个句子谈点肤浅的看法。

《离骚》中有这样几句：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第一个注释《楚辞》的王逸是这样注的：“悔，恨也。相，视也。察，审也。延，长也。伫，立貌。《诗》曰，伫立以泣。言己自悔恨，相视事君之道不明审，当若比干伏

节死义，故长立而望，将欲还反，终己之志也。”“回，旋也。路，道也。回，一作迴。迷，误也。言乃旋我之车，以反故道，及已迷误欲去之路，尚未甚远也。同姓无相去之义，故屈原遵道行义，欲还归也。”

洪兴祖补注说：“异姓事君，不合则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则是不察于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

以上王逸和洪兴祖的意思，似乎屈原自己离开了朝廷，现在悔悟了，觉得不该离去，愿意回去即可回去。离开朝廷完全是屈原自己走上了迷途。

朱熹《楚辞集注》说：“悔，追恨也。察，明审也。”“言既至于此矣，乃始追恨前日，相视道路未能明审，而轻犯世患，遂引颈跂立，而将旋转吾车，以复于昔来之路，庶几犹得及此惑误未远之时，觉悟而还归也。”

朱熹的意思是，诗人自己认为以前走错了路，趁惑误未远，觉悟还归。即产生了“退隐”的思想。此说从者甚多。

郭沫若对这几句是这样译的：

“我失悔我的路向是根本走错，我停顿着又打算要路折回头，

把我的车马掉过来走向归路，要趁着这迷途未远赶快罢休。”

根据屈原的整个思想情感，长诗的基调和有关资料，以及从上下文义来看，似应这样解释：

“悔相道之不察兮”，悔，作恨，怨恨解。指怨恨楚怀王（王逸虽将“悔”字讲成恨，但随后就说是“自悔恨”）。

悔，作恨解古已有之。《诗经·云汉》：“敬恭明神，宜无悔怒。”毛传：“悔，恨也。”朱熹：“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敬事明神，宜可以无恨怒也。”《后汉书·卓茂传》：“夫厚性宽中近于仁，犯而不校邻于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显然“悔”字是可以作“恨”字解的，而且这个“恨”，绝非什么“自悔恨”。

再者，诗人对自己的“茂行”从来没有后悔过，对自己的高洁信念始终不怀疑。《哀郢》篇作于晚年，其中说：“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可见诗人就是将“从彭咸之所居”时，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事。何悔之谈呢？

《离骚》中还有两处涉及“悔”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而这两处又很清楚地说明诗人忠贞不二，不管遭受什么样的打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悔意。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悔相道之不察兮”的“悔”绝不是诗人悔恨自己，而是怨恨楚王不成器，不了解忠臣之心。正如诗人自己所说：“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齎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中，诗人怨恨楚王不止一次，而自悔处却找不到佐证。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此“疾”字就是怨恨的意思。这就是说，屈原怨恨国君蔽明害公的情绪，司马迁早已看出来了。

相，《集韵》：“助也。”《易·泰卦》：“辅相天地之宜。”相即辅佐。相道：辅佐之道，臣佐君之道。不察：不

体察，不了解。

全句意思是，怨恨楚王不体察臣子尽忠之道（排斥了忠良，放逐了屈原）。

“延伫乎吾将反”，延，伸长了脖子。伫，踮起脚跟。延伫，此意为渴望，迫切希望。反，返回朝廷，返回到楚王身边。全句意为，我迫切地盼望能有一天返回到楚王身边。

“回朕车以复路兮”，回，令我回去。复路，再度走上正确的道路，即再次走上图强治国之路。全句意思是，快把我召回而使国君重新走上图强治国的道路吧！

“及行迷之未远”，及，趁。行迷，指楚王走上迷途。未远，还不太遥远。全句意思是，趁君王您啊，走错路还不太遥远。

这四句连起来的意思是，怨恨楚王不体察为臣之道，不了解怎样做的才是好臣子。屈原忠心一片，耿介不移，反遭排斥、打击乃至流放。但他热爱祖国、忠于国君的思想是毫不动摇的。他迫切希望楚君趁迷路不远，早日省悟，把他召回重行美政。

这样解释，与后面“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两句扣得更紧一些。因为这两句明明是说，作者欲行又止，即盼望怀王召他回去。与《涉江》中“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两句是同样的意思。诗人被迫离开朝廷、离开国君之后，每走一步都是忧心忡忡，步子沉重，一步三回首。这就充分表明了屈原真挚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而这种感情与前四句是紧密关联着的。正因为屈原盼望返回朝廷，唯恐远离国君，所以才步马兰皋，椒丘止息，恭待王命。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離騷



〔清〕門應兆 作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此数语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屈原绝不是在恶劣环境中，遭受种种不白之冤后，而想“杀身无益，不如退而求全”的；而是被排斥、打击乃至流放在外后，仍然归心似箭，望眼欲穿。《抽思》篇中说：“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自己的躯体即使回不去了，灵魂也要回到故国去，竟然在一个晚上就跑回去九次。可见思国之深，念君之切。他渴望重被重用，实行美政，振兴祖国。诗人在长期流放途中，又亲眼看到祖国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他忧心如焚，痛苦不可言状。因此，他更加坚决地盼望返回朝廷，重行美政。当他意识到返回去的希望不大了时，他的爱国思想丝毫也没有减弱。所以在《哀郢》篇结束时说：“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诗人以鸟恋故乡，狐狸死在外地时，头也要向着久居的山丘作比喻，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己爱国主义的内心世界。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屈原对国君总是抱有一线希望的，总是希望国君早日省悟，弃旧图新，召他回去，实行美政。这是屈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一环。而《离骚》是屈原最成熟的、最系统的自叙生平的政治抒情诗，怎么能不突出这一中心呢？因此，把“悔相道之不察兮……”四句，解释为诗人怨恨楚君不察，盼望楚君省悟，及时地把自己召回去重行美政，似更符合诗人感情的实际。

有人说：屈原的思想是有波动的，此四句往后的一段文字，是长诗的转折点。他们认为这个转折就是诗人在上文强调坚持真理、为国忠君，反遭迫害；此处考虑杀身无益，不

如退而求全。但诗人不甘寂寞，于是产生了相君于四方的意念。并说，这也是情节上的波澜起伏、荡气回肠之处。所以他们的结论是：还是把“悔相道之不察兮……”四句解为思想的低潮——“退”为好。其实，这仍然未脱开朱熹的讲法。

本文并不否认屈原曾产生过“退”的思想，但是，他这个“退”是在百盼返回朝廷而不得实现时产生的，而不是考虑到“杀身无益”时产生的。而他这个“退”绝不是对前事的后悔，恰恰进一步说明了他的坚贞不屈。诗人明确表示，就是“退”，也要保持昭质的信芳。他的“退”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所以诗人此时信念并未减弱。正如在《离骚》中反复强调的：为了坚持真理和正义，“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宁溘死以流亡”。足见屈原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死对他来说，绝不是最大的痛苦，不是引起他“退”的主要根据。引起他“退”的思想的产生，主要原因是国君执迷不悟，百盼无望，而自己却“老冉冉其将至兮”，没有施美政于祖国的时机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写出了“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的诗句（即实在进取不成了，就是“退”，也要保持诗人当初的高洁美质）。屈原的思想一直是积极的，所以他表示无论是进，是退，都要坚持正义的立场。当然楚国的现实也迫使诗人产生过择君而仕的思想，但这种想法始终与爱国主义相比较着，又总是被爱国忠君思想所压抑和控制着的。到了“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时，远游他方的想法就被彻底摧毁了，爱国主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可见诗人思想的波澜起伏是有的，《离骚》的

情节也是曲折的。但“退”的思想，情节上的低潮并非表现在“悔相道之不察兮……”四句上，而是表现在“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二句上。但这“退”的本身决不是悔恨自己走错了路，而是保持高尚操守的另一种形式。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表明他的高洁信念并没有改变。

我认为如上分析、理解“悔相道之不察兮……”四句诗，更能合乎诗人的原意，便于更好地体会屈原一团火似的千回百转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离骚》所独有的艺术成就

《离骚》是一篇才气莽荡、思潮飞腾、情感如火的长篇抒情诗。它充分反映了屈原无比深厚而真挚的眷恋祖国、热爱祖国的火热感情和为了正义、光明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全诗三百七十三句，二千二百多字，大体可分前后两部分，以“岂余心之可惩”为界。

前部分反复咏叹自己为国为民的一生，反遭到国君的冷遇、流放，使他“无路请缨”，报国无门。因此，诗人极度痛苦、悲伤。但屈原在极度苦闷、悲愤之中对自己的爱国信念、光明理想仍然坚贞不渝，“九死不悔”。他在绝望之中还寄寓着国君醒悟，重行美政的一线希望。

长诗的后部分写作者在无限痛苦之中，无法摆脱之际，曾作过自己前程的设想。屈原以设想中的女嬃、灵氛、巫咸和他对话的形式，表达了他耿介不移，坚贞不渝的一团火似的爱国主义精神。女嬃以亲人身份向屈原一吐衷肠，要他放弃节操，与世俗同醉相安。灵氛替他不平说：“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意思是说，天下何处无有识君人，你为何硬是留恋故国呢？巫咸鼓励他及时往四方“求矩矱之所同”（即寻求志同道合者）。三个人的督促，在“众芳芜秽”的年代里似乎都有各自的道理。因此，屈原南征求舜指